

清代闽粤移民与东南亚华人秘密结社的流布^①

潮龙起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州 510632)

摘要: 遍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秘密结社是清代闽粤两省大量移民的结果。闽粤移民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秘密结社的: 一是随着天地会的成员传入国外; 另一途径是移民仿效国内秘密结社的方式在海外自行创立的。

关键词: 清代 移民 东南亚 秘密结社

秘密结社是早期海外华人移民中的一个主要社会组织, 它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 在早期华人社会史的研究中, 当占有一席之地, 特别是在秘密社会相对活跃的东南亚地区, 这正如海外华人研究的著名学者颜清湟先生所言,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 如果离开了华人秘密会党,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¹可喜的是, 近年来, 海内外学者, 如颜清湟、麦留芳、邝治中、蔡少卿、邱格屏等人, 潜心钻研, 皓首穷经, 出版了几部较有份量的著作, 发表了若干论文, 主要探讨了海外华人秘密结社的内部结构、社会活动和社会功能, 秘密社会与华人社会的相互关系, 当代华人帮会的堂斗与犯罪等问题。但是, 由于秘密结社这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其资料获取存在着诸多困难², 致使一些问题众说纷纭, 未能澄清³; 秘密社会的研究领域也待拓宽, 研究的视角有待转换。本文主要从清代闽粤两省的海外移民着手, 探讨东南亚华人秘密结社的流布及其传播途径。

一 清代闽粤移民与东南亚华人秘密结社的流布

在构成清代诸多的海外移民因素中, 一般来说, 促使移民的推力要大于拉力, 中国的海外移民大都属于生存性移民, 或说是一种被动性移民, 这与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动荡的政治环境有关。特别是人口的长期快速增长, 对清代社会的整体变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所言: “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 “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也许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⁴。近年来, 这一论点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在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 人口的长期快速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承载力, 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温饱线之下。⁵随着生存资源的严重匮乏, 很多贫苦农民被迫离开家园。为了谋求生路, 寻求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 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穿州过县或飘洋过海, 纷纷向外迁徙。总的说来, 清代闽粤两省的人口流向主要是从人口稠密的已开发地区向四周人口稀少地区或内陆山区扩散: 向东为当时未开发的台湾地区; 向西为广西、云南、贵州等人口稀疏的边陲地区; 向北为与福建和广东交界的江西、湖南等未开发山区; 向南则为东南亚、澳洲等地区。虽然广东、福建两省的移民在地区选择上各有侧重, 但大抵是沿着上述四个方向移民的。移民在迁徙过程中,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应对各种问题, 也将天地会这种秘密结社带进了移住地。

作为清前期最大的秘密社会组织——天地会, 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福建闽南的漳州创立后,⁶最先在闽粤两省流布。我们在考察天地会的传播地区后, 可发现它基本上是按照闽粤两省移民的上述四个方向发展的。从海外天地会的分布情况看, 它也都盛行于闽粤两省人民集中的地方。在荷属印尼, 根据吧城公馆档案记载, 天地会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就出现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爪哇岛。这年, 发生蔡整遭天地会之人殴打案件。蔡整向吧达维亚华人公馆提出申诉, 要求甲必丹黄绵舍、林汉丹对天地会成员陈玉山、陈清观给予处罚。道光六年(1826年), 吧城又有黄天水、程谦朗、李亚四、蔡审等七八人在大南门外新池酒灶设盟结为天地会, 并有纸厝、凉伞、令旗等物。⁷咸丰元年(1851), 英国人在爪哇的日巴拉(Japara)发现了有关天地会的秘密文件。同治二年(1863), 荷兰殖民当局又在爪哇巴

^① 本课题由暨南大学博士启动资金资助, 项目编号为: 51104615。

东(Padang)地方的华侨家里搜获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在爪哇岛中部的日惹一地也出现了“三万兴”、“义兴”、“和合”三个天地会组织。⁸天地会在荷属东印度公司所辖印尼的出现,明显的与闽粤两省移民有关。当时印尼的华侨大多来自福建及广东两省,尤以广东籍为多。福建华侨则以闽南的厦门、漳州及泉州为多。若以方言划分,则主要有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闽南人等。⁹位于加里曼丹西部著名的“兰芳公司”,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止于清光绪十年(公元1885年),前后达108年之久。在兰芳公司内,有华人三万多。它的元首是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先生,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福建的客家人。

作为东南亚地理之中心,马来亚半岛之华人秘密结社尤为昌盛。据载,英人莱特(Francis Light)占领槟榔屿八年后的1894年,曾致函孟加拉州总督时,称“他们(指华人)会组织私会党”。¹⁰这说明,在此之前,华人秘密社会就已出现在马来半岛。及至十九世纪中叶,马来半岛的华人秘密会党势力日益壮大,当时大部分华人都网络其中。¹¹光绪十五年(1889),英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了镇压秘密会党的法令,当时予以解散的各会之名称派别有:新加坡的福建义兴、广惠肇义兴、潮郡义兴、海南义兴、客属义兴(又名松柏馆)、义福、义信、福兴、广福义气、海山;槟榔屿方面有义兴、大伯公、义福、福胜、海山、福德社、联义社;马六甲方面有义兴、福明、福胜、义保、海山等。¹²而在马来半岛内陆地区,先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马六甲附近的卢骨(Lukut)、双溪乌绒(Sungei Ujong)、间征(Kanching)等地发现了锡矿,继而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雪兰莪的北部及暗邦、霹雳的太平和近打河流域发现了大量锡矿。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海峡殖民地华人及华南地区大量的贫困人民不顾生命危险,远涉重洋,前往矿区开采谋生。下层社会是秘密会党产生的温床。特别是在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暴力冲突十分频繁、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的矿区,作为一种武装暴力组织的秘密结社,自然成为人们依归的对象。在当时半岛的两个锡矿中心——雪州和拿律,秘密会党的海山公司和义兴公司,几乎网络了所有的华人矿工。同治五年(1866)至同治十二年(1873),长达八年的雪州内战,就涉及以惠州客家人为主的海山公司和以嘉应客家人为主的义兴公司这两大帮派。而在拿律矿区,会党的帮派斗争更为激烈和漫长,前后断断续续共达十七年之久,涉及的会党有海山公司、大伯公会、义兴公司、和合社等。¹³从半岛内陆的会党成员来看,他们大部分来自广东客家地区的惠州、嘉应等地,也有少部分来自福建。如在雪州海山公司的大本营吉隆坡,十九世纪末期的人口构成显示,客家人有24575,占华人总人口的71.3%;广东人3806人,占华人总人口的11%;福建人2883,占8.3%;潮州人计912,占2.6%;海南人569人,占1.6%;海峡殖民地侨生1724人,占5%。¹⁴而在拿律矿区,其成员也大致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惠州、嘉应、新宁、增城等地。在义兴会党活动的另一个集中地——檳城州威斯利省,根据官方记录,1891年华人人口共有8265人,计广东1280人,福建541人,海南62人,以惠州人为主的客家人2148人,潮州人3366人,海峡侨生866人。¹⁵从当时马来亚内陆半岛的成员构成来看,广东、福建两省的移民无疑对创建和传播华人秘密结社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菲律宾,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30名粤籍华侨自美国移居菲律宾,组织洪顺堂。不久,洪顺堂改名为义英堂,吸收各地来菲的华侨入会。渐渐地,福建人成为洪顺堂的主要会员,占该堂总人数300人中的三分之二。¹⁶到清末及民国年间,天地会系统分化为五大支派,称“菲律宾洪门五房”:长房,洪门进步党,社会基础最广、成员最多;二房,洪门致公堂;三房、四房,洪门竹林协议总团;五房,洪门协和竞业社。这五房当中,除二房的成员多为广东籍移民外,其它三房的成员都以闽籍为主。¹⁷可见,菲律宾华人秘密结社的兴起与发展也离不开福建和广东的移民。

在泰国,华人秘密社会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中部地区和南部半岛。其名称在早期泰国官方称为大兄会,到了曼谷王朝第五世王时称为洪字会。南部的洪字会出现较早。据载,嘉庆十二年(1809)已在普吉岛建立。及至嘉庆十三年(1810),普吉岛与马来亚的槟榔屿两地洪字会缔结了友好关系。到了光绪七年(1881),南部洪字会的规模已明显扩大。以德古

巴城为例，义鑫会有会员 3200 多名，公恩会有会员 800 多名，较晚建立的和生会势力较小，也拥有会员 300 多名。¹⁸十九世纪后半期，泰国华人秘密结社多次发生了暴动，严重扰乱了地方社会秩序。鉴此，泰国政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颁布了《秘密会党法令》，对其进行严厉控制。但是，华人秘密结社势力仍然不减。根据泰国官方记录，“曼谷在 1889 年至少有 67 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不同的秘密会社”，到 1902 年，“所有中国人（指当地华侨）都属于这个或那个秘密会社”¹⁹。从泰国华侨的来源地看，他们主要是以潮汕人为主的闽粤人。根据德国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的观察，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籍民由广东极东部的潮州府大量移来。大多数均系从事农业的人；至于客家人多半是工匠。来自福建同安县的移民很少，他们大多数是水手或商人。海南岛人主要是小贩或渔民，‘他们也许很穷，但却是最快活的阶级’”。²⁰作为泰国华人秘密结社的首领郑智勇，人称“二哥丰”，势力强大，财力雄厚，就是来自广东潮州海阳（今潮州市）。因此，可以说，以潮汕人为主的闽粤移民推动了秘密结社在泰国华人中的传播。

在缅甸，早在十八世纪末就出现华人秘密结社。据查，它是从马来亚半岛传入的。清嘉庆四年（1799），有人提到，“曾在下缅甸苜基埠见四邑人所建‘义兴馆’（三合会）里，挂有嘉庆四年匾额”。²¹咸丰二年（1852），在仰光广东观音庙已有“开圩”接纳新丁的洪顺总堂了。光绪八年（1882），闽籍的青莲堂和胜公司成立。光绪十六年（1890），因海峡殖民地政府禁止华人秘密结社，于是洪顺总堂改名为武帝庙，以宗教面目出现。从 1852 年至 1942 年的九十年间，洪顺总堂的堂员共计 21158 人。1951 年，在仰光的华人社团中，洪门之类的社团仍有 20 个，约占全部华人社团的 9%。²²很显然，缅甸的天地会是广东、福建两省移民传布的结果。

在越南，华人秘密结社传播较早，这与地缘因素有关。早期的秘密会党主要以越南为基地，经常往返于越南和中国广东、福建、广西之间，与中国天地会声气相通，联系密切。光绪元年（1875），曾有很多越南人加入，扩大了天地会的社会基础，结果使天地会一时成为越南南方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对法国殖民者威胁最大的力量。为此，法国殖民者想方设法将其剿灭。光绪八年（1882），法国人终于在越南南部发现了以会馆名义进行秘密活动的天地会分会，通过调查，摸清了它的一些活动。它的会众从中部华侨商人那里获得武器。通过分析，法国人还猜测越南天地会的活动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认为，居住在鹅贡的皇太后的家族可能与天地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其结果是：法国人驱逐了顺化朝廷派驻交趾支那的代表，还发动了一场清理法占区以清除天地会及其他反法分子的活动。²³到 20 世纪初，越南华侨中天地会组织相当普遍。其中“会的基础最强的是在嘉定、堤岸、边和、土龙木、槟榔和、朱笃各省”²⁴。特别是在堤岸，华侨中三合会的堂口很多，有广肇、潮、福、客家、海南等帮会，而其中“广肇帮”最大的堂口为华胜堂，在堤岸有会员八百多人；其次是联义堂，有会员三、四百人。²⁵可见，闽粤两省的移民对越南天地会的传布作用很大。

总的来说，清代东南亚华人的秘密结社是由闽粤两省的移民传播开来的。这一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看出。在清代的秘密结社中，我们可根据秘密社会的祭拜对象和基本仪式将它们划归为天地会、哥老会和青帮这三大系统。它们各自都有主要的活动区域，如天地会主要在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中心的南方数省，哥老会主要分布在长江一带，而青帮则主要以运河两岸及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活动在海外的华人秘密结社，基本上都是天地会。尽管其有很多变名，如各种“公司”、洪门、致公堂等，但其入会仪式、会内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隐语暗号等，基本与国内的天地会相同，属于天地会系统。这说明它是由闽粤两地的移民传入的。有人提到，海外华人中有哥老会组织，但未提供具体材料予以证明，令人难以置信。²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海山、华胜、义福、大伯公是由汉留会发展起来的，汉留就是天地会。²⁷本人认为，这一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汉留当是指哥老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尽管晚清及民国时期，有人出于需要，说天地会与哥老会源出一家，汉留就是洪门，但是没有令

人信服的材料能予证明。

二 清代闽粤移民与东南亚华人秘密结社的传布途径

天地会向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闽粤两省天地会的成员传入国外，而这些成员往往是在国内聚众起事，遭到当局严酷镇压后，被迫逃亡海外。

乾隆五十二年（1887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就有大批天地会成员为逃避清政府的迫害，而远逃南洋。²⁸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南方数省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闽粤两省又爆发了天地会起义，如广东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福建厦门的小刀会起义，还有在肇庆府爆发的与红巾军起义有瓜葛的土客大械斗，致使这一时期有不少的天地会成员在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洋。如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谋反，居民附之者甚多，事败，逃往南洋，于是都人侨居南洋群岛，经营商业，娶妻成家者，日益众”。²⁹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印尼“糖业大王”的黄仲涵，其父黄志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逃离清政府迫害而来到印尼的。他在当时参加了“小刀会”的革命活动，在“小刀会”起义中担任一名管理军粮和军服装备的军需官职务。在起义军遭镇压失败后，于咸丰八年（1858）和两位兄长黄信卓、黄卓丕离开家乡，在厦门港搭乘一条商帆船逃到印尼爪哇，后来定居于中爪哇三宝瓏。这次小刀会领导人之一的黄位，在起义失败后，乘海艇退到海上，后来在安南侨居，度过他的晚年。³⁰而根据布莱兹（Blythe）的记载，厦门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率领起义军乘船南渡。船队中的四艘于1853年12月到达新加坡，还有一艘于次年抵达，此后还有零星到来的，总共约有20000人。³¹在闽南小刀会爆发的同一年，福建永春县霞陵人林俊领导了天地会一支的红线会起义。起义失败后，林俊子观麟、远柔和起义农民姚元泽等一齐逃到南洋。³²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天国余众流入四邑，加上广东的本地人与客家人的长年苦战，使壮者纷纷渡洋往外邦谋生”。³³另据老华侨杨汤诚回忆，同治三年（1864），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参加过当时红巾军（天地会之别名）的原籍在番禺、花县及广州郊区的破除农民和失业小手工业者，溃散后随残部辗转回到广东，为了避免清军的缉捕和株连，这些幸存的义军，被迫逃到香港，然后分途桴海到新加坡、马来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北美洲，成为华侨先驱拓荒者的一个组成部分”。³⁴类似于这种情况的人去南洋的还有不少。

这些逃往南洋各地的天地会成员，有些本身就是天地会骨干，他们来到南洋后，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然会重操旧业，继续传播和发展组织，从事各种活动，以满足其社会需要。如籍隶广东新宁的曹亚志（珠、枝、芝、符义）约在十九世纪初年来到槟榔屿谋生。南来之前，他已是天地会成员，南来后，他在槟榔屿组织义兴公司。当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时，他跟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是当时秘密组织义兴公司的一个领袖，……莱佛士把曹亚志带到新加坡，这个组织也就跟曹亚志移植到新加坡来了”。³⁵他曾积极参与华侨社会中的反清活动。

二是由闽粤两省移民传入。在组织创立上，天地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简易而又不讲究严格师徒传承关系的结社形式，这使任何一个民间凡夫俗子在不需具备很高的社会条件下，如知识、财富、才识等，仅凭会党会簿、腰凭或干脆不要任何凭证就可自行传会，成立组织。这也是天地会能在国内广泛传播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漂泊海外的闽粤移民来说，他们大都生活贫困，得不到清朝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扶助，因而流浪异地他乡，孤单一人，精神寂寞，这种情形迫使他们需要寻找或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替代原有的亲族、乡族等社会关系，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而历史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和“梁山聚义”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特别是就天地会活动中心的闽粤人民来说，他们对这样一种社会习俗更是耳熟能详。因此，为了应对生存的危机，他们往往通过中国传统的歃血结盟方式，参照天地会的一套仪式、规范，结社拜会，组成团体，相帮相助。如十九世纪中叶，泰国的华侨几乎为清一色的男子汉，绝少妇女移民，而且不少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当时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在泰国很盛行，其首领称“大哥”、“二哥”、“三哥”。这些背

井离乡来到泰国的独身华人，他们一般以血缘或同乡关系参加一个“洪字”帮派组织，在帮派组织首领“大哥”的领导下，过着集体的生活，什么地方需要劳工，由首领进行接洽及派工，所得报酬，扣除房租、伙食等费用以及首领的报酬外，余下的钱由首领分发给组织内的弟兄。³⁶在缅甸，以福建人为主体的会党组织——缅甸洪门和胜公司和缅甸仰光建德总社，都标榜“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以实力保护本组织成员为职责，它们都有专职的保卫行动人员。³⁷由于秘密社会能使早期移民团结互助，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病疾相扶，这种基于地缘、姓氏为纽带的联合体，在中国清政府不予理睬，而华人社团组织未成立的情况下，成为流移海外的华人藉以自济自救、在海外立足的组织。³⁸海外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天地会简明的创会形式会使闽粤移民在一定的情形下自行创会，其结果必然促使天地会在其足迹所到之处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遍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秘密结社是清代闽粤两省大量移民的结果。闽粤移民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秘密结社的，一是随着天地会的成员传入国外；另一途径是移民仿效国内秘密结社的方式在海外自行创立的。

注释

- ¹ 邱格屏：《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1 页。
- ² 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第一，由于秘密社会通常是下层群众的集合体，其生存资源不是依靠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如在早期的南洋地区，很多华人秘密结社就参与了“猪仔”贩卖，控制“烟、赌、娼”而获取暴利，因而这种生存方式违反了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而不为社会所认可，这样决定了其活动通常是秘密的，外人很难了解其内部情况。正因如此，海外华人秘密结社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这一身份，这正如曾任海峡殖民地华民政务司的布莱司（W.L.Blythe）所说，华侨差不多都与三合会有联系，但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会员，这是很难理解的。（见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 5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51 页。）。Turnbull 也说，即使是在英海峡殖民地政府宣布秘密社会为非法组织之前，很多参加这一组织的大华商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这一身份，在公开场合也否认自己与秘密结社的联系（见 Sharon Castens,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Malaya: The Case of Yap Ah Loy”, 参见：David Ownby, Mary Somers Heidhues (eds.): “Secret Societies” Reconsider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E. Shape, New York, 1993, p149.）；第二，秘密社会的成员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多，他们对自己的活动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即使存在有关他们组织起源和活动宗旨的传说和会簿，如“反清复明”、“替天行道”等，这也常是为了掩饰其真实目的，给其行动戴上“政治”光环，使其具有社会合法性的缘由。第三，为了不给封建政府留下任何凭证，以逃避封建政府的残酷打击和血腥镇压，大多数会党在诵读念熟会簿等会内文书后，即将之焚毁。
- ³ 如海外秘密社会出现的时间问题；早期秘密结社的名称——“公司”的来源问题；乾隆四十二年（1777）罗芳伯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西部坤甸地方建立的兰芳公司的性质问题；等。
- ⁴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5 页。
- ⁵ 有关清前期广东省人口数量与粮食供应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引起的社会问题，雷冬文同志对之有详细论述。见《近代广东会党——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28 页。
- ⁶ 尽管天地会的创立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乾隆二十六年说是建立在可靠的档案资料基础上，得到了相当多的人认同。可参阅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45—58 页；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103 页。
- ⁷ 关于海外华人秘密结社最早出现的时间问题，有很多说法，但据可靠资料记载的，则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在 1799 年马来亚的槟榔屿，如温雄飞、吴玉成等，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 378 页；而林远辉、张应龙等则根据书蠹《槟榔屿开发史》及巴素的《马来亚华侨史》所载的资料，认为早在 1794 年的槟榔屿就已出现华人秘密会党，见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4 页。笔者认为，由荷人包乐史、吴凤斌两人合作整理的《吧城公馆档案》是

目前关于天地会在海外出现最早时间的可靠档案资料,见包乐史、吴凤斌:《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第229—230页。

- ⁸ (荷)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天地会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版,序言。
- ⁹ 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 ¹⁰ [英]巴素(V·Purcell)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版,第29页。
- ¹¹ 关于十九世纪英属海峡殖民地华人参与会党的数量和规模可参阅邱格屏:《世外无桃园——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第52—55页。
- ¹²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137—139页。
- ¹³ Leon·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Survey of the Triads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J.J.Augustin Incorporated Publisher Locast Valley, New York,1959, p102-105, 154-173.
- ¹⁴ 引自陈剑红:《甲必丹时代的吉隆坡华人社会》,见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157页。
- ¹⁵ 王琛发:《惠州人在大山脚开发史上的地位与组织的变迁》,见马来西亚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第181页。
- ¹⁶ 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 ¹⁷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浅说》,《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13—114页。
- ¹⁸ (泰)素帕拉·乐帕尼差耶功著,杜建军译:《1824—1910年泰国洪字会秘密会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南亚与东南亚资料》,第6辑,自印,转引自张映秋:《泰国华人社团模式的演变》,载《潮学研究》(三),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1995年版,
- ¹⁹ [美]G·W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
- ²⁰ 引自巴素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上),(台)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74年版,第151页。
- ²¹ 吴玉成:《四邑人出国初探》,(香港)《地平线》双月刊总第27期(1983年4月),第23页。
- ²² 引自方雄普:《朱波散记——缅甸华人社会掠影》,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77页。原著公元纪年有误,笔者引用时更正。
- ²³ Hue—Tam Ho Tai,Millenarianism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Vietn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55.转引自王士录:《近代越南的几个主要秘密会社组织》,《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1期。
- ²⁴ (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卷一,251页,引自仓心言:《南洋洪门会党与辛亥革命——兼论南洋洪门会党与美洲洪门的异同》,《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 ²⁵ 刘汉翘:《孙中山对越南华侨进行革命宣传忆述》,《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 ²⁶ 徐进功:《论十九世纪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²⁷ 同1,第189页。
- ²⁸ 同12,第110页。
- ²⁹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 ³⁰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卷七十九,会党起义传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
- ³¹ 同1,第169页。
- ³² 郑炳山:《泉州华侨与辛亥革命》,见《泉州华侨史料》编委会:《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泉州市侨务办公室1985年印行,第24页。
- ³³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7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页。
- ³⁴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人沧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 ³⁵ 马来西亚华团简史编委会:《马来西亚华团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9年版,第117页。
- ³⁶ 许肇琳:《泰国华人社区的变迁》,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³⁷ 冯励冬:《缅华百年史话》,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2页。

Cantonese and Fujianese emig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roadcast of Southeast Chinese Junto

Chao Longqi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361005)

Abstract: The widespreading Southeast Chinese Junto was the result of the large number of emigration of Cantonese and Fujianes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outheast Chinese Junto broadcasted in two ways, one was introduced by the Tiandi number, the other was the same way as other Chinese Junto founded.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 emigration; Southeast ; Junto

收稿日期: 2005-6-10

作者简介: 潮龙起, 男,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人员。